“爱我中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文汇报社

山里表弟的买车梦

胡春麟

山里人爱做发财梦，我远在江西吉水县一个偏僻小山村里的表弟多年来却爱做买车梦。55岁的表弟已经几易其车，用当地老表的话说，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不过这些年来，表弟的买车梦总能成真。

20世纪80年代，表弟还是个走村串户的小木匠。每天清晨，人们还在酣睡中，表弟就得背上斧头、锯子、弯刀等“吃饭家伙”的筐，踏着露水出发了。表弟的木工手艺在十里八乡很出名，每次都是披着浓浓的夜色归来，喘着粗气把几十斤重的工具卸下车，他总是自言自语地慨叹：“要有辆自行车该多好啊。”

1983年的一个冬日，表弟买了第一辆黑漆外电，电镀把手，崭新的“永久牌”“二八大梁”自行车，在夕阳的余晖中挺胸昂头地进村了。听着车轮转动时悦耳的沙声，看着光亮反光能照出人影油漆，全家人眉开眼笑了，这是农村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第二天早上，表弟将工具筐往车后架上一夹，一蹬一踏，……留下一串清脆的铃声出门了。为了晚上收工骑车安全回家，表弟还别出心裁地

在车上装了一个小电灯，有了它表弟不再每天赶早徒步上工了，骑自行车往返每天可以节省近2小时，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照料家里、干家务活。

转眼一年过去，乡村的道路上有了“突突突”屁股冒烟的摩托车。最初是那种既能载人，又方便载物的“嘉陵50”。刚才还在后面“突突突”，转眼就追上了表弟的“永久”，一溜烟又消失在前面拐角处。这情景惹得表弟心里痒痒的，回家对父母说：“什么时候咱家也能有一辆摩托车，载着你们二老风光光去吉水县城去！”表弟意识到，光靠做木工赚钱，这买摩托车梦可不容易。

没过多久，机灵古怪的表弟发现，城里收购鸭子的大商小贩都聚集到了表弟的山里村口，村民们肩挑手提的五六只小鸭，几乎不怎么讨价就被过称装进了笼。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里的四季鸭是有名的土特产品，城里人加工成板鸭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听说还漂洋过海去了东南亚。从此后，表弟的自行车后座上装的不再是木工“家伙”，而是走串村上户收购来的四季鸭，然后又气喘吁吁不停

蹄地送往吉水县城和吉安市。那时，表侄们偶尔还能从表弟的包中搜出些从县城里捎回的糖果点心，或苹果、香蕉等时令水果。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写下诗篇”，与时俱进的表弟换了辆“铃木”牌摩托车，自行车便退居二线了。换了车，表弟如虎添翼，一天能跑好几个乡镇村收上几百只鸭鹅了。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春天，表弟做生意成了乡里搞活城乡流通的万元户致富能手，披红挂彩受到了县长的表彰。有钱后的表弟想，不能忘记自己的苦痛经历，自己富裕了，还要帮衬着乡亲们增收，索性在农村信用社贷了点款，加上积蓄，买了辆十万元的农用汽车，将乡亲们的鸭、鹅、鸡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跟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客商做起了生意。他还带动十几个下岗职工和乡亲组成了贩销合作社，形成了收购、贩运、销售一条龙的生产线。后来表弟干脆自己饲养种鹅，孵化鹅苗。2014年，初尝养鹅甜头的他决定扩大生产规模，牵头发起由5家农户组成，共筹资10万元的农民

专业养鹅合作社，到现在这个合作社已发展有骨干农户10户、受亲朋好友影响加入的60多户农户组成的经济互助组织。表弟也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带头人。他说，“产业规模的扩张，完全得益于党的惠农好政策，得益于当地银行的大力支持。”2016年，他获得了银行的“惠农信贷通”，一次性最高可贷款300万元，而且是无抵押、低息，还可以随贷随还、循环使用。今天，他手握“掌中宝”指挥着合作社的6辆农用汽车夜以继日地为乡亲们的鸡、鹅、兔、生猪、井冈柚、生姜、蔬菜、瓜果跑物流。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农村大地。去年冬天，我坐上表弟的私家小汽车去他家小山村做客，站在村头那棵樟树下，极目远眺，村里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一条条水泥路宽阔整洁，绿树掩映，碧水环绕，民富心畅，让人觉得是那么静穆与和美，令人感叹新农村变化之快，世间变化之大。来到表弟家我挑逗地问他还做“买车梦”不？表弟语气坚定，充满信心地说：“一个人的信心来自于自己。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有梦才有希望，才有动力。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甜美。明年我还想买辆‘宝马’车开进山里。”

果然，今年春节，表弟兴高采烈地开着“宝马”进山来了，春节后又开着“宝马”，带上老爸老妈快快乐乐地上北京旅游，一家人其乐融融。

自从今年7月启动“爱我中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活动后，本报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征文，经过有关专家的初评、复评，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本次征文活动，感谢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

饮用水的变迁

周建道

“甜不甜家乡的水，美不美故乡人”。我的老家安徽省临泉县土陂乡南三里庄——淮河边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就像千百万个村庄一样，70年间，沧海桑田，星转斗移，发生了翻天覆地覆的巨大变化。细数生活中点滴变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家乡饮用水的变化。

“鸟无翅不飞，人无水不活”。说起吃水的经历，村里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人王金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解放前，村里地势高，加上没有人会勘探地质，也没有人会打井，乡亲们只好到离村3里的邻村周寨村挑水。“前弯背，后罗腰，喝水贵如油，庄稼难到腰”，因此，邻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

“水是生命之源”，“雨露滋润禾苗壮”。从上世纪50年代起，乡亲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开挖了4口大塘，把“无水村”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家家户户喝的都是池塘水，自然村里会指定一个池塘为饮用水，平时不允许牛、猪在池塘里洗澡（俗名打汪），鹅鸭在池塘里嬉戏。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每天清晨，爸爸妈妈挑着水桶到清水塘里挑水，然后倒在家里的大水缸中，再放点碎末，随后水会清澈见底。我们在家口渴了，就用水瓢直接在水缸里舀水喝，印象中小时候没有喝过开水。我记忆犹新的，有一次放学后口渴得很，家里是“铁将军”把门，嘴里、眼里干的冒火、喉咙里冒烟的我没办法，就直接到池塘边，用双手捧水喝，那水中还有少许杂质，还带着泥味……

因为当时明矾很贵，都是由奶奶掌管，只有奶奶到姑姑家，才由妈妈掌管。那个年代的乡村几近赤贫，一户人家一个暖水瓶，相当于“标配”。暖水瓶的热水，平日只够喝水用。可到了严寒，清早洗漱成为首要用途，即便每人接一杯水，一大家子轮不到最后，暖水瓶已然空空如也。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70年代，家乡一度干旱，解放军来到村里，及时给村里打了机井，解决了乡亲们的燃眉之急。人、牲口和耕地都要用水，村里还购置了一种叫马拉井的提水设备。这个设备像家乡磨坊里的石磨，马、驴、骡子等牲口一套上，乡亲们一声吆喝，井水就源源不断的提出来，比人工有省力气效率又高。“机井一转，井水汪汪”，乡亲们都说“喝水不忘挖井人，感谢亲人解放军”。这颗种子发芽、生根、开花、结果，1998年，我携妻从戎、从军报团……

家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概70年代末，一天，我家院子里来了好多人，人多人力量大，很快就打了一口井，井深3丈，井水充沛丰盛，喝起来特别甜，由于井水多，冬暖夏凉，洗衣洗菜

做饭都用井水，既方便快捷，又轻松惬意。还有，提水不再用笨重的木水桶，用的是口径约莫3-4指（约5公分）、高约0.5米、底部有橡皮阀门的、白铁皮制作的提水专用桶，又轻又好，家里喝水再也不用挑了，父母外出或者下地干农活，我和奶奶就能解决喝水问题。水井普及后，省去了每天挑水的辛苦，喝的水也比之前干净多了，但农村遍地开花的水井，谁也不知道水质如何。乡亲们只好自我解嘲说“不干不净，喝了没病”。

上世纪80年代末，手压井似乎一夜之间如雨春笋般涌现起来了，取代了老井和池塘水。和老水井相较，压水井优势是压倒性的。记得头次压水，引水灌入井头，只几下，圆润、清亮的水流，划过一股弧线，响亮地落进桶里。水便利了，生活也就“活”了。最先“活”的是院子的花园，春开玉兰，夏绽芍药，秋放金菊，虽称不上万紫千红，但却是生机盎然。

90年代，电动自吸水泵、潜水泵得到了广泛普及，彻底解决了汲水问题。乡亲们轻轻一按电钮，电机转动，地下二十米深处的水，轻轻松松到了厨房、楼下和楼上。花园、新建的池塘，也都跟着沾了光。接一根塑料软管，水流便可直通花园——隔三差五浇顿饱雨，草木们这回真有福了！池塘水换得勤，圆润的、碧玉般的荷叶，出落得亭亭玉立；鱼儿灵动极了，倏忽聚散，宛如一道道红色闪电。风吹荷动，鱼儿嬉戏，竟生出些许江南的风致……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今，乡亲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生活条件也芝麻开花节节高。村里在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邮路、电路后，又建设了高标准的自来水加工厂，为村民免费安装了自来水，不用挑不用提，把水龙头一转就出水。以前只有在电影电视、城市家庭才有的纯净水、高端净水器、直接饮用的饮水机，早已遍地开花，成为司空见惯

的物品；雨水污水分离、合理综合利用、村村污水集中处理……家乡水环境越来越卫生洁净，家乡水环境越来越好，家乡环保理念越来越先进，村里80、90岁的老人一年比一年多，乡亲们的幸福指数一天比一天高……

“一叶一知秋”，“观水知变迁”。从艰辛、费时费力的井水，从浑浊、肮脏的池塘水，到苦涩、难以下咽的浅层地表水，到洁净、高标准、高质量的自来水、纯净水、直饮水，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家乡的饮用水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卫生，越来越便捷。饮用水的变化，是我国农村发展一个巨大的缩影、一个生动的写照。未来，我的家乡、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发展将会更快，农民、农村、农业将会更加美好。

电视变迁

王加月

30年前的农村贫穷落后，很少见到电视机，至少我们一个小村庄都没有，邻村倒是有一台9英寸的熊猫牌电视机，虽说屏幕有点小，还是黑白的，而且最令人头疼的是，电视只有几个频道，逢周二还要“休台”，电视画面也不清晰，有“雪花”，需要用室外天线接受信号，不停地调整方向，就是这样的电视却也是一件稀罕物。每到寒暑假或者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排成队去人家看电视。

由于舍不得电费或者电视机的主人太爱惜电视机了，往往电视到点的时候才打开电视机，一集或者两集结束了立即关掉电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恩不尽的，能看到电视真的不容易啊！有时候去早了，电视机的主人在做着事情，我们就做做假似的帮忙扫扫地啦、擦擦菜啦……其实我们的小伙俩人家心明眼亮着呢，总是乐呵呵地提前打开电视机或者推迟关电视时间，我们一个劲地夸他们家人好。遇到下雨天我们就没辙了，心里火急火燎的，因为大人不让我们跑那么远的路冒雨去看电视。如果我家也有一台电视机该多好啊！

从茅草房到新楼房

王火清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奉贤大地发生了巨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农村因工业化开发、道路和高压线等建设，许多农户告别了老宅，住上了动迁安置的高楼大厦，我是2010年6月入住四团镇文苑苑的，与解放时住的茅草房相比，真是翻天覆地，获得感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党给我们带来了好生活。

我1943年2月出生，大多农户的住房是茅草房，结婚时父亲给我一间半房半灶的平房，因年久失修逢下雨天，总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雨，有时人在田里干活下起雷阵雨，回家里满地是水，加上地面是泥土，大人和小孩不知跌了多少跤，黄梅季节屋茅水流下来似酱油汤，那个年代，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茅草房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瓦房。那时奉贤地区小瓦（土窑烧制）紧张，一般农户因分不到就想方设法用柴去浙江调小瓦。我也有过这段经历，随着子女长大，需建4间瓦房。为了调小瓦，在海塘管理所划到一块低矮的芦苇滩，亲友帮忙一天时间割好芦苇，并运回生产队仓库，后来又在邻居家买了500斤稻柴，放在芦苇一起，作好外出调瓦准备。

1976年12月的一天，我和妻子把柴和生活用品装在一辆5吨水泥船上，3人从仓库前的小河出发，途经四团港，浦南运河，然后进入黄浦江。

外出第二天中午，在松浦大桥处发生意外，一支橇的橇板与橇柄相接处外面铁皮折断。这时我心里焦急万分，经商量必须把弯曲的铁板敲直，再附加上角铁或铁板用电焊焊接。于是，我和帮手张国新把橇扛在肩上，向南找到一条小道，然后沿着小道快走，看到行人就问：“前面有小工厂吗？”有人回答：“在前方不远了。”走了约3里多路，终于看到一家小工厂，到小厂门卫处，我俩已是满头大汗，我放下橇给门卫处每人发一支大前门香烟，接着我苦苦哀求说：“我是奉贤人，这次外出去浙江用柴调小瓦，途中橇断了怎能去呢？祈求你厂用电焊把橇焊好，费用我会付，谢谢你们帮忙。”一番话打动了门卫处许多人，于是叫来了

电焊工，推出了电焊机等设备。电焊师傅忙着为橇焊接，焊接好后我俩扛着橇向黄浦江小跑走去，来回约2个小时，这次挫折使我终生难忘。

第三天下午，船已到了浙江省嘉善县，那里烧制砖瓦的窑厂多，河道中停靠着许多调瓦的船只。第四天早上，经常来这里调瓦的帮手上岸，与窑厂谈我调瓦事宜，约半小时，他回到船上对我说：“已讲好了，1斤柴调2.5张小瓦，柴与瓦作价现金结算，即柴每斤0.03元，小瓦每张为0.02元。”这时，我们把柴从船上搬到岸上过磅。然后结算，经过磅柴重量3400斤，可调8500张小瓦，柴价为102元，瓦价为170元。瓦价减去柴价应付68元，付清钱后赶上回家的路。

回家路更艰辛，因为去时柴的重量少，回程装在船上小瓦重量多，船比去程下沉了20多厘米。船只露出水面不多，白天行程也可以，晚上行船须十分谨慎。睡觉我不敢熟睡，怕拖轮和大驳船经过有大浪。所以，当船只有大的起伏时，就起身向外张望以防发生事故。

1979年，我搬出老宅，建造了4间平房，终于告别了屋里漏水的状况。之后，农村开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变了过去吃不饱的状况，并每年可以获得一笔可喜的经济收入，后来随着子女的长大，着手筹备平房翻建楼房的事。1983年，我把平房翻建成4上4下楼房，从此住上新楼房，过上幸福生活。

2008年夏天，我房因工业区开发被拆迁，2011年6月28日，入住动迁安置房，有53和120平方米的二套，儿子为我装修房子，走进新房，看到新型的家具和电器，配套的生活设施，心潮涌动，觉得这是生活质量的又一次提升。

我老家在原邵厂镇良民村，从奉贤最东南的邵厂乘车去区城南桥，一路上可以看到的是，公路两边原来的民房大多被拆迁，拔地而起的农民新村随处可见，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工业园区、道路建设和村庄改造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奉贤正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我住茅草房到二次建房，再到入住新房的过程，记录着家庭和时代的变迁。

家政策好了，给百姓带来了许多的实惠，改革开放为我们指引了一条富民之路。乡亲们说的一点也不错，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百姓也逐步过上了幸福生活。就拿我们家来说吧，继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之后，在我15岁那年，父亲在外做工挣了点钱，家里添置了一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是真正的、我梦寐以求的大彩电啊！虽说价格是黑白电视机的几倍，但父亲似乎并没有十分心疼的样子，甚至比当时买黑白电视机时还要大方，他说家里有钱了，农民也挣到钱了，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还愁以后没好日子过吗？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有了大彩电，那台黑白电视机被搁置在了一边，屏幕上的那张能把黑白变成彩色的透明纸依旧粘着，只不过已经积满了灰尘，有时候会去擦擦，边擦

边想，儿时的情景就像现在的电视机节目一样精彩纷呈：排队看电视、露天式的电视……一幕又一幕在眼前浮现，可是那时的艰苦岁月已经不复存在，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段段回忆，回忆有心酸、有快乐、更多的是感慨，感慨生活的美满、感慨政策的健全、感慨新中国带给我们的利好。

现如今，我们家也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每个房间都装上了不同尺寸的液晶电视，画面清晰、音质优良，不是有线电视就是网络电视，要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和以前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而且应该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惠民政策。电视机的变迁在祖国大发展的领域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是一个缩影，见证了70年期间社会变迁和个人变化的历程。

国庆期间，首都北京披上节日盛装（新华社图片摄影才扬）

七十年的七次搬家

朱希祥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吉星照佳地，紫气指新梁”等古诗词，形容与象征的都是中国人搬迁的意境与崇信。今年70周岁的我，竟然也如此般地搬迁（上海人叫“搬家”）了七次之多，几乎是每十年一次。

父母如何十五、六岁就从浙江乡下迁至上海工厂工作，我不知道。直到有记忆的小学一年级时，才知道当时我们居住的是闸北长安路一带，比豫地龙稍好一点的贫民区。同一个工厂工作的三家老乡住一个号码中的三间小屋，每间10平方左右，家家都是5人以上。我家是7口，人最多。只记得三家的煤球炉一字排放在狭窄的走廊上，走路路异常小心。难熬的是夏天，要么么蒸笼火炉，热不可耐；要么大雨后，水漫金山，浑浊的泥水冲入房间，多次贴近床板……

1958年，父母厂里自建共助，在普陀区（当时的西郊区）陆家宅后村盖了

两幢两层楼的工房。我们有了一板之隔的二楼两间共20平方的小房。虽还是两家合用一个厨房，也还在使用每天要倒和刷的马桶，我们已觉得舒畅许多。

之后，我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又算是大搬了一次家——离开上海去住了集体宿舍。那里只是经常塌陷的木板床和着火的土炕。

单位不分配新居）。这样我又开始后面的四次搬家。先是让我与学校另一位困难职工同住离校不远的两个两居室的套间；每家12平米，合用厕所和厨房。因是新公房，相对独立，我已有点满足。

不久又让我搬入曹杨新村的一个14平米的独间，三家合用厕所与厨房。空间还是太小，一张写字台，儿子做功课，我只能在床沿上写备课笔记和科研论文。两个书橱占去了一半的房间，也有点书香味。

这两处又住了十年。1990年，我妻子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在漕河泾镇边建新房和分新房（称之为福利分房）。我们有幸搬进了两室一厅的不到60平米小套间。看房时，已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高兴地跳起来说：“我们有五个房间了！”他把厕所厨房都算上了。

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市场经济的兴

起，我们又不安分而此山望那山高，觉得房屋还是太小、太吵（因近马路），就四处寻觅合适的住宅。结果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搬到了普陀嘉定交界处的三室两厅两卫的133平米的住房中。这下，我们有真正的书房兼电脑室了！

近二十年的安居居住，我很满意了。太太和儿子却说，这里绿化不行，地铁没有，是不是再动脑筋搬到更适宜栖居的地段和新房？

真是梦境不断，奔完小康望富庶啊！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普通的工人孩子，经过历练，也如多次搬家一样，步步前行，层层递进，成为“灵魂的工程师”；说不上“辉煌”，可也称得上是“艰辛”。退休后还担任着学校关心下一代和协助社会力量办学的工作，与时俱进，继续憧憬着更美好的生活，期待祖国更灿烂的明天！